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

主 编 聂珍钊 副主编 王松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撒旦之死：

美国人如何丧失了罪恶感

THE DEATH OF SATAN: HOV

LOST THE SENSE OF EVIL

安德鲁·戴尔班科 ◎ 著

陈 红 等 ◎ 译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

主 编 聂珍钊 副主编 王松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撒旦之死： 美国人如何丧失了罪恶感

THE DEATH OF SATAN:
HOW AMERICANS HAVE LOST THE SENSE OF EVIL

安德鲁·戴尔班科 © 著

陈 红 郑 杰 罗 爽 郑昭梅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撒旦之死：美国人如何丧失了罪恶感 / (美)戴尔班科著；陈红，郑杰，罗爽，郑昭梅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

ISBN 978-7-5446-3017-7

I. ①撒… II. ①戴… ②陈… ③郑… ④罗… ⑤郑… III. ①道德—研究—美国
IV. ①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7626号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uthor Andrew Delbanco and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For sal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本书仅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香港、澳门、台湾除外)销售。

图字：09-2011-556

出版发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200083

电 话：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蔡一鸣

印 刷：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张 12.75 字数 283千字

版 次：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46-3017-7 / I · 0228

定 价：47.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编委会名单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

顾 问：陈众议 玛乔瑞·帕洛夫 庄智象

主 编：聂珍钊

副主编：王松林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守仁

史惠风

吴 笛

陆建德

陈 红

陈建华

罗良功

胡亚敏

胡全生

隋 刚

曾繁仁

蒋洪新

谢 群

总序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是一套学术翻译丛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丛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文学批评领域的院士中，选择9位院士的文学批评力作，译介给中国学术界。所选内容涵盖诗歌批评、小说批评、戏剧批评和文化批评，尤其对当代美国诗歌批评的学术成果做了重点译介。最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外国文学批评界大量翻译介绍了国外的文学理论著作和思想著作，对我国的文学研究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外国文学理论著作的翻译相比，对外国某一领域的有代表性的文学批评专论的译介还有待加强。这套丛书产生的初衷，就是想在这方面有所弥补。本丛书力图通过对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家精心之作的翻译，向中国学术界展示“理论热”之后，美国文学批评家如何更新文学批评方法，以更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更包容的态度对不同类型的文学进行有效的批评。与一些所谓的解构主义批评不同，在这些出色的学术研究中，文学的边界不仅没有消失，文学本身不是正在死去，而是以新的特点获得了新生，充满了活力，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的永恒魅力。我们从这套丛书中还可以看出，一个伟大的负责任的批评家不能利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去曲解文学、误导读者甚至去毁灭文学，而应该通过批评与阐释，探索文学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以及社会的价值，引导读者阅读和欣赏文学，从中得到教诲。这一点对于我国文学批评中盛行的文学经典的戏说和大话倾向，其警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套丛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美国文学批评领域的成就，编者期望这套丛书能对我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建设有所启示，进而推动我国人文学科的学术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AAS)创办于1780年，是一个蜚声世界的、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这个组织每年都要在美国及世界范围内选取当代最杰出的人才成为该院的院士。在230余年的历史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公共管理等各领域一共选举产生了4000多位美国院士和600多位外籍院士，其中包括20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和100多位普利策奖获得者。目前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文学批评领域(含语文学学者)且仍然健在的院士仅有169人，他们均是当今诗歌、小说、戏剧和文学文化理论及批评方面的顶级专家，其学术思想在美国及世界文学和文化批评界都有着重大影响。

20世纪堪称是一个“理论的世纪”。建国以来，国内出版界组织力量翻译了大量外国文艺理论经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推出的“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共同推出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意义重

大。这两套丛书的选材范围涵盖了从古希腊罗马至现代的文学理论，几乎囊括了国外最重要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对我国的文学研究和理论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被介绍引入中国，如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批评、以社会和历史为出发点的审美批评、在心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分析批评、在人类学基础上产生的原型—神话批评、在语言学基础上产生的形式主义批评、在文体学基础上产生的叙事学批评，还有接受反应批评、后现代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文化批评、伦理批评、生态批评等。这些批评是我国文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批评方法，形成了我国文学批评中西融合、多元共存的局面，推动着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造就了我国文学研究领域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可以说，外国文学理论的引进极大地开阔了我国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使我们的研究走向深入。然而，在一阵阵理论热浪的背后，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这就是文学批评偏离了对文学的批评。有一些打着文化批评、美学批评、哲学批评等旗号的批评，往往颠倒了理论与文学之间的依存关系，割裂了批评与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出现了某些理论自恋(theoretical complex)、命题自恋(proposition complex)、术语自恋(term complex)的严重倾向。这种批评不重视文学作品(即文本)的阅读与阐释、分析与理解，而只注重批评家自己某个文化、哲学或美学命题的求证，造成文学理论与文学文本的脱节。在这些批评中，文学作品被肢解了(用时髦的话说，被解构了、被消解了)，自身的意义消失了，变成了用来建构批评者自己文化思想或某种理论体系或阐释某个理论术语的自我演绎。文学的意义没有了，自然文学的价值也就没有了，其结果必然是文学的消失导致文学批评家的自我消亡。这种倾向的产生，一方面是我们对西方一些影响巨大的思想家如德里达、利奥塔、拉康、赛义德等人的理论的误读或消化不良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在翻译介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时还没有为中国学者提供充分的可供学习和借鉴的范例。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选择了9部当代美国文学批评的力作译介给读者，试图展示当前美国文学批评界“理论热”之后建立在文本细读和学术洞见之上的另一幅批评图景。

自20世纪90年代起，盛行于美国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开始在美国学界遭受冷遇。对于美国大学英语系名目繁多的理论课程，赛义德十分不满，将其称为“残缺破碎、充满行话俚语的科目”。2006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的时任主席、著名批评家玛乔瑞·帕洛夫也针对文学批评理论与文学的泛文化批评乱象告诫同行们说，大学的文学批评教授们可能是在“没有适当资格证明的情况下从事文学研究的……而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学家、气候学家、医生、律师等必须掌握一套知识后才被认为有资格从事本行业的工作，我们的文学研究者往往被默认为没有任何明确的专业知识”(参见威廉·崔斯：“英文系的衰退”，《美国学者》2009年秋季刊)。美国布朗大学教授罗伯特·斯科尔斯也将大学英语专业的衰落归咎于理论的过度膨胀。在不少专家看来，那些花样翻新的时髦理论消弭了文学的人文价值，抽空了文学的道德情感内涵。美国国内的这一反“理论热”现象很快引起了我国文学研究界有识之士的注意，并引发了对“理论热”之后的美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热烈讨论。例如，本世纪初我国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与讨论，就是在理论热之后对文学理

论与批评的深度反思。我们认为，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的批评，因此文学批评不能离开文学文本。只要脱离了文学，不对文学的文本进行分析和解释，文学批评根本就无法存在。只要脱离了文学文本，所谓的文学理论只能陷于空谈，变得毫无价值。我们反对“不读而论”的概念推理式研究，推崇富有情感交流的、有个人洞见的对文本的解读式批评，主张批评者要担当起文学批评的伦理责任。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我们此次翻译的这套文学批评丛书，就是为了给国内学者如何认识和理解文学批评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范例。

译丛选取的9部专著，涵盖了诗歌、戏剧、小说等文学领域，可以说体现了当今美国批评家的创造性思想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其中有3部关于诗歌的专论。《激进的艺术：媒体时代的诗歌创作》的作者是斯坦福大学玛乔瑞·帕洛夫教授。她站在美国当代诗歌的最前沿，用最敏锐的眼光审视媒介时代的诗歌创作，高擎智慧的火炬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学术天地。她用精深的学识和批判性的研究引导着当代诗歌学术研究的发展，评论家称她是一位“阅读精确、拒绝将艺术的评判权拱手交给教师或理论家”的作者。《语言派诗学》的作者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查尔斯·伯恩斯坦教授。他是当今美国“语言诗派”的代表诗人和理论家。他从意识形态和审美的角度讨论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美国诗歌特征，尤其是他对语言诗的语言、声音、形式与意义以及政治策略的研究，是我们认识和解读语言诗的一部指南。

《诗与感觉的命运》的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苏珊·斯图尔特教授。她是美国具有广泛影响的诗人、批评家和教育家，帕洛夫教授、伯恩斯坦教授分别称其为当今“国际最顶级学者”之一和“本世纪文学批评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她的著作援引上至古希腊下至后现代的诗歌经典，论述了诗歌与人类触觉、视觉、听觉等感官的内在联系，从艺术审美的高度探究了诗歌艺术在人类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在原来的选题计划中，我们还选择了美国圣母大学吉拉德·布伦斯的《诗歌的材料：诗学理论概要》一书准备译介给国内学界。该书对当今美国先锋派诗歌的写作实践做了哲学层面的解读，认为诗歌的意义隐藏在诗的创作和阅读的空间之中，主张读者应该像人类学家那样回到诗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现场去寻找意义。遗憾的是，由于未能获得这本书的版权，我们无法将这部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

在戏剧研究方面，我们选择了著名莎学专家、前国际莎士比亚协会主席大卫·贝文顿教授的著作《莎士比亚：人生经历的七个阶段》。贝文顿教授是当今为数不多的最重要的莎士比亚专家之一，在莎士比亚研究领域享有崇高地位。他把莎士比亚一生分为七个阶段，对莎士比亚的历史背景、个人生平、戏剧创作及舞台表演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驾轻就熟，思路清晰，说理透彻，成就了这部研究莎士比亚的经典之作。

在小说研究方面，我们选择了3部著作。耶鲁大学克劳德·罗森的《上帝、格利佛与种族灭绝》从文学人类学和后殖民批评的角度出发，通过细致入微的文本考究，批判了近五百年来欧洲对所谓异邦“野蛮人”的“他者”文化想象，涉及的作家有斯威夫特、蒙田、王尔德、萧伯纳等，视野开阔，见解独特，启示深刻。霍普金斯大学埃里克·桑德奎斯特教授的专著《福克纳：破裂之屋》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角度研究了福克纳的作品主题、结构及其与南方神话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福克纳不能不读的著作。爱荷华大学盖勒特·斯图尔特的著作《小说暴力：维多利亚小说的形义叙事学解读》从文体学与叙事学的

角度，就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家笔下强大的语言力量的表述与情节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解读。该书研究方法独特，注重文本细读，是近年来小说研究的重要成果。

在文化批评方面，哥伦比亚大学安德鲁·戴尔班科教授的《撒旦之死：美国人如何丧失了罪恶感》一书，如作者自己所说，是“一部美国精神传记”。作者对美国过去和现代之间的道德传统的割裂，特别是对美国社会面临的道德危机及精神信仰的匮乏进行了批判，作者也因此而被《时代杂志》评为2001年度“美国最佳社会评论家”。宾夕法尼亚大学让-米歇尔·拉巴泰教授的《1913：现代主义的摇篮》将现代主义文学纳入1913年这一特殊的年代，详细考察了1913年发生的一系列标志性文学艺术现象和政治事件，如非西方作家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战爆发前最后的世界和平、叶芝和庞德的合作等，从全球文化思想变化及交融的角度审视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发端，视角独特，见解深刻。

20世纪以来，美国的文学研究空前繁荣，出版了大量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但我们只能从中挑选部分杰作，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以上译介的著作，都是文学批评各个领域的代表性作品。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同行们在文学研究方面有其突出的优点：方法多样，务实求新，细致深入，特色鲜明。这些专著均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借得认真阅读和参考。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给中国读者的文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译丛选择的著述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不易阅读、理解和翻译，因此对于译者而言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尽管各位译者做出了巨大努力，希望把这些学术著作翻译得完美，但是由于水平有限，仍然无法达到目标，在此请各位读者多加批评指正。

主编 聂珍钊

谢辞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即将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我们借此机会首先向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先生表示衷心感谢。陈众议先生长期关注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关心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学术发展，关心中外文学与文化的交流。这套丛书的选题、论证和整个翻译工作，都倾注了他的热情和关心。他的珍贵友谊、热情鼓励、宝贵建议，是我们完成此项工作的动力。还要衷心感谢玛乔瑞·帕洛夫教授。她是这套译丛的顾问，为我们初选的著作提供了实事求是的和富有建设性的学术评价，为我们联系每个作者和协商版权提供了重要帮助，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她都能及时地热情地帮助我们。可以说，这套译丛得以面世，陈众议先生和玛乔瑞·帕洛夫教授是我们最需要感谢的人。

我们还要感谢这套丛书的各位作者，他们是：玛乔瑞·帕洛夫、查尔斯·伯恩斯坦、苏珊·斯图尔特、大卫·贝文顿、克劳德·罗森、埃里克·桑德奎斯特、盖勒特·斯图尔特、安德鲁·戴尔班科、让-米歇尔·拉巴泰。我们不仅要感谢他们同意我们翻译他们的著作并在中国出版，还要感谢在翻译过程中他们提供的各种帮助，感谢他们随时解答译者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相信，他们的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中国的学者和读者都将大受裨益。我们还要感谢这套译丛的美国出版社，是它们的充分合作和授权，才使这套译丛的中文翻译和出版得以顺利进行。

我们还要感谢庄智象教授、副编审孙静女士，以及所有著作的责任编辑。庄智象教授既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社长，也是这套译丛的顾问。这套译丛从选题、翻译到出版，与他的指导和帮助是分不开的。这套译丛也是他特别倾心的一个项目，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人一生要做几件有意义的事，而这个项目正是他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事之一。孙静女士是出版社这套译丛的具体负责人，她不断对译丛的翻译工作提出具体指导和帮助，这套译丛倾注了她的大量心血。每部著作的责任编辑都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们对每部译著都进行了仔细认真的审校，提出十分重要的意见，消除其中的疏忽与瑕疵。我们还要感谢刘华初先生，他负责这套丛书的版权谈判。是他辛苦和有效的工作，为我们奠定了顺利完成这项工作的基础。还要感谢负责这套译丛的装帧设计的美编，因为是他的精心设计才最终使这套译丛的出版变得完美。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参与这项工作和为我们提供帮助的所有人。离开了大家的共同努力和来自各方面的帮助，要完成这样一项大的工程是不可想象的。对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心存感激。

献给道恩

译者序

《撒旦之死》的作者安德鲁·戴尔班科(Andrew Delbanco)是美国文学史与宗教史领域的知名学者,其著作涉及美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曾被《时代杂志》称为“美国最杰出的社会批评家”。

戴尔班科生于1952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和博士学位,1985年至今一直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并从1995年起担任人文学科的朱利安·克拉伦斯·利瓦伊教授(Julian Clarence Levi Professor)。他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也曾担任过美国笔会中心的副主席。

戴尔班科的著作颇丰,除了本书外,还写有《清教徒的苦难》(1989)、《必读书目:为什么美国的文学经典对于今天的我们意义重大》(1997)、《真实的美国梦:关于希望的思考》(1999)、《梅尔维尔:他的世界和他的创作》(2005),以及《大学:过去、现在和将来》(2012)等。其中《清教徒的苦难》和《梅尔维尔》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颁布的年度莱昂内尔·特里林奖(Lionel Trilling Award),戴尔班科因此成为继爱德华·塞义德(Edward Said)之后两度获此荣誉的教授。他还被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了杰出教师奖。此外,他于2003年被纽约人文科学委员会推举为纽约州年度学者;2011年他接受了由奥巴马总统亲自颁发的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奖章,成为全美该年度的九位获奖者之一,其获奖理由是他所写的“有关美国高等教育问题的著作以及有关经典作家在过去及当代生活中的地位的著作”加深了美国人民对于人文学科的理解。

《撒旦之死》出版于1995年,在这部书中,戴尔班科同样以美国文学经典为线索,揭示美国文化所遭遇的宗教及道德的堕落。但与大多数探讨此类问题的学者所不同,戴尔班科并没有去关注上帝这个美国人宗教信仰中善与正义的始源,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其对立面——魔鬼撒旦的身上。戴尔班科之所以另辟蹊径是因为在一般人看来,一个人可以背弃对上帝的信仰或对善的坚守,却似乎永远无法否认恶的真实存在,但《撒旦之死》却让我们看到了与此假设截然不同的事实,即有关邪恶的概念正在迅速地从美国人的道德意识中消失,其势令人担忧。

在这部被作者称作“民族精神传记”的书中,戴尔班科回顾了美国社会过去三百年间围绕着对邪恶的认识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从早期的清教徒时期开始,历经殖民时期、内战、维多利亚时期、进步主义运动时期、一战、二战,直至20世纪下半叶的所谓后现代时期。作者以一组发生在当今社会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作为全书的开篇,指出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罪恶上演的剧目从未如此丰富,而我们的反应也从未如此麻木”。作者告诉我们,曾经被称作“撒旦”或魔鬼的恶,有过具体生动的形象,但从18世纪开始,它逐渐从我们的想象世界中淡出,而这个淡出的过程一直持续至今,并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度。作者在呈现事实的同时,也在字里行间埋藏着一个又一个尖锐无比的问题:如果像纳粹实施的种族大灭绝这般的滔天

罪行都可以被人们有意无意地遗忘，那么在我们的道德词典里是否还有“罪不可恕”一词？罪恶景象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生活中日渐模糊化和寻常化，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普遍的道德沦丧？

其实作者抛给我们的问题远不止于此。他让我们认识到，在人们与罪恶的观念日渐疏远的同时，他们似乎又在寻求以某种更隐蔽的方式，如阅读的方式，来满足他们探寻罪恶根源的心态，而他们从各类畅销的恐怖小说中得到的结论几乎总是千篇一律：那些如撒旦般的杀人狂魔不是天生的，是社会造就的，他们也是牺牲品。但本书作者借用《沉默的羔羊》中的疯子医生对年轻女探员的挑衅性话语提醒读者，现代工业化体制让人们可以轻易为恶行去谴责机构和社会，而不去直面自我这个真正的罪恶根源。这里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作为独立个体的人是否需要为有实无名的罪恶承担责任？作者的答案很明确：面对罪恶感的消失所带来的道德危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直面罪恶，即承认其客观存在；为此，我们有必要像过去那样以概念化的方式去思考罪恶，但这并不意味着恢复我们曾有的对罪恶的认知，而是要去更新旧有的认知。

戴尔班科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是美国人，他要以自己对邪恶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去唤醒美国人的道德危机意识，而事实上他在书中提出的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同样适用于其他文化。比如，我们该如何理解日益频发的自然灾害，以及种种或新或旧的、让人无法摆脱的疾病？它们是上帝因人们的罪恶而实施的惩罚，还是令人无法预料的不幸？这些问题有着高度的现实性，只是我们可能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无法接受作者提出的任何一种解释，但毫无疑问的是，作者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打破思想的惯性，促使我们去深入思考。或许我们每个读到这本书的人都可以反思：今天的中国是否也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道德危机？我们又该如何应对？也许这就是此书的价值之所在！

翻译《撒旦之死》的工作是艰辛的，但也是快乐的。艰辛自不必说，快乐则来自两方面，一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思想启迪，二是团队成员间的通力合作。我们的团队共有四人，除我之外，还有郑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英语文学博士毕业，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罗爽（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系博士研究生）和郑昭梅（湖北第二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为了在可能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保证这本书的翻译质量，我们每个人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大家相互配合，共同担当，才有了这次完满的合作。罗爽负责本书的引言及第一、二章，郑杰负责第三、四章，我负责第五章以及第六章的前两节，郑昭梅负责第六章的后几节及第七章。郑杰还协助我完成了对全部初稿的审阅和修改，郑昭梅也部分参与到这项工作中，她俩还合作翻译了以全书题记形式出现的史蒂文斯的小诗，译文也是诗意浓郁。当然由于我们能力有限，整部书的译稿远不如我们相互间的合作那般完美，但我还是要在对此对其他三位成员表示由衷的感谢。另外，还要感谢策划这套丛书并负责全面协调的聂珍钊老师和王松林老师，以及具体负责我们这本书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蔡一鸣编辑，蔡编辑的专业建议为本书增色不少。

陈红

2012年11月于上海

致谢辞

本书的写作始于国家人文科学中心，在那里我度过了一个弥足珍贵的学期，那段时间的阅读和思考最终确定了本书的研究选题。非常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和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他们的资助使我得以完成这部作品。同时我还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数位研究助理的鼎力相助，尤其是琳达·安斯沃斯(Linda Ainsworth)和迈克尔·埃利奥特(Michael Elliott)。琳达为本书核对了参考书目并编写了索引；迈克尔则无数次被我深夜或清晨的电话所扰，每当我需要查找某本书或确认某个事实，他总是有求必应。安吉拉·达令(Angela Darling)则帮我准备送审的文稿。此外，一些读者也给予了我非常宝贵的反馈意见，尤其是在麻省理工大学，阿尔文·基贝尔(Alvin Kibel)和哈里特·瑞塔沃(Harriet Ritvo)所提的建议，恐怕现在连他们自己都不记得了，但那些建议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令我获益良多。迈克尔·斯托勒(Michael Stoller)精通基督教教义的发展史，他好意为我校读了关于奥古斯丁和早期教会的章节。尽管本书是我第一次未受恩师阿伦·海默特(Alan Heimert)直接影响而完成的作品，但他教授的如何阅读和思考美国历史中的文化和宗教的课程，我始终铭记于心。

感谢我的出版经纪人弗吉利亚·巴伯(Virginia Barber)，他做了大量分外的工作，阅读了多个版本的修改稿，给予了我中肯的建议和始终不渝的精神支持。同时要感谢伊丽莎白·西夫顿(Elisabeth Sifton)，她在我构思尚未完全成形前就签下合同，之后耐心等待稿件出炉，并给予了它任何作者所能期望的最高赞誉——激烈而又精准的批评。谁说“好编辑已经绝迹”，伊丽莎白就是这一说法活生生的反例。

在我的家人和朋友中，我的兄弟尼古拉斯(Nicholas)和托马斯(Thomas)用心阅读过书稿，我的父亲以及我的好友埃里克·汉密尔(Eric Himmel)也阅读了书稿，并不厌其烦地帮我查找部分内容。在写作此书的几年中，我的两个孩子本杰明(Benjamin)和伊冯(Yvonne)有时会看到父亲像个魔鬼一般从书房里冒出来，这对他们的耐心真是场考验。我无比感激他们对我的包容。最后，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道恩(Dawn)，在我生命中，是她让我最真切地感受到了世界的美好和优雅。

引言

在我们的文化之中，日益暴露出来的罪恶和我们能够用以消除这些罪恶的智力资源之间已经出现了一条鸿沟。恐怖的景象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地传播，这样地恶劣骇人——从组织有序的死亡集中营到原本可以避免的在饥荒中挨饿的儿童。几乎在每周的报纸和电视节目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青少年为了几美元协议杀人，女子因为皮包和皮草被当街谋杀，年轻的男子因为吉普车遭劫而被一枪毙命，以及大量诸如此类的新闻——而这些只是国内头条。在我即将写完这本书的时候，《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又刊登了一篇关于前南斯拉夫监狱集中营的报道。据该报道称，波斯尼亚的男囚犯被赤身裸体地带到院子里，在他们面前塞尔维亚的女囚犯被剥光了衣服；男囚犯的阴茎一旦勃起，就要被割掉。而不远处，一群狱卒强迫一对父子当着他们的面性交。

罪恶上演的剧目从未如此丰富，而我们的反应也从未如此麻木。我们无法用语言把我们的内心世界同在外部世界看到的恐怖现象联系起来。慈善和抗议似乎有形无实，随意选择着受益对象或场合。如今人们普遍认为(特别是在海湾战争中上演了发射巡航导弹的戏码以后)，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夺命的战火与电子游戏中的扫射和轰炸别无二致。当真有什么新的残酷现实引起我们的注意时，我们可能会感到些许焦躁或困扰。我们会打个颤儿，皱皱眉，然后换个频道^[1]。

在罪恶面前我们无能为力，这种危机是如何产生的？在美国这样一个主导西方文化的国度，这种危机又是如何进入人们意识的？这是本书的主题。但这不是一部关于犯罪或犯罪学的历史书，也并非记录伦理哲学或宗教教义的发展历程，更不是呼吁谁来干预各种各样的人际冲突。本书采取民族精神传记的撰写形式，从美国的童年开始记叙。正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他那部堪称所有论述美国的著作中最尖锐的作品中提到的，如果我们试图“察看外部世界在(一个民族的)混沌未开的心智之镜上投下的初影”，就应当“观察这个还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孩”。^[2]对于三百五十年前尚处于婴孩时期的美国而言，罪恶曾有一个名字，一张脸孔和一种解释。它被称为“堕落”，化身为魔鬼，是伊甸园中原罪的根源，是上帝降罪于人的祸首。人们认为这是一个罪恶满盈的世界；罪恶是由弥尔顿(Milton)在《失乐园》(*Paradise Lost*)中所描画的那个长着“一双凶煞眼睛”的魔鬼，那个被“悖逆的骄傲和难消的憎恨”所驱使的受造之物，亲手播种并精心培育出来的。他魅惑万端，无人幸免。

在美国文化发端之时，这个魔鬼在大部分人的生命中灼然可见，他象征并解释着个人所遭遇的和那些施加于他人的种种苦难。然而到了1700年，他已逐渐失去了对人类想象力的掌控——这个历程从那时一直延续至今，用心理学家

亨利·默里(Henry Murray)的话来说，如今的撒旦在人们眼里“不过是一个衰微的意象，一个已消逝时代的丧志失意的遗迹，一个无法在人类想象的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的蹩脚演员，其作用就好像肚子里的一截盲肠。”^[3]在我们这个幻想破灭的时代，一位颇有名望的历史学家最近指出(在此他非常具有代表性)，希特勒这类的大刽子手让我们“审慎地将那种使人完全失常的精神分裂症与不能用来推卸责任的间歇性失常行为区分开来。”^[4]这种区分对于死在他们手下的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毫无意义。如果说那些集中营的始作俑者患有“分裂症”，这意味着什么？如果要称这些狂魔患有精神失调，并在学术讨论中争辩他们的疯子名号能否帮他们开脱罪责，这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再称他们为魔鬼？

当我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自己的那段成长岁月时，我意识到，这种不再给罪恶命名的过程尽管发端于几个世纪之前，但在我那个时代获得了极大的加速度。我的父母是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曾躲避过希特勒的迫害。他们在家说德语的次数少得可怜，部分原因可能是对家里的孩子来说，德语充满了叫嚷和咆哮，甚至连昵称都听着刺耳。不过，我们还是零零散散地学会了几个德语单词。其中我们常常听到并使用的一个词是“übel”；在肠胃型流感(或称流行性感冒，我父母在英国呆过十年，他们一般这样说)要发作的时候，我觉得“übel”，而不是“恶心”；如果我在乘车的时候看书，或是在吃完一顿蘸满奶油的大餐后马上再来一块萨赫巧克力蛋糕，我都会觉得“übel”。直到后来我才知道“übel”在德语里指的是罪恶——另外一个侧重意义大相径庭的词“Böse”也含此义。在我二十多岁以前，“übel”似乎带有那么点儿罪恶的意思，比如说，我们会用它表示“恶臭”，以此来形容我父亲最爱吃的林堡奶酪，就是我们称为“Stinkekäse(臭奶酪)”的奶酪——至少在它被小心翼翼地放入玻璃钟罩之前，我们都这么说。

在我父母成长的那个年代，罪恶和臭气一般不会混为一谈。我的母亲曾含着眼泪告诉我，约瑟夫·戈贝尔(Joseph Goebbels)是魔鬼的化身——她称他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然而，即使对她来说，übel这个词所表示的罪恶之意也已逐渐消减，仅仅意味那些无伤大雅的小痛小痒，它指的是那种喝点苏打汽水，或者散散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就能治愈的恶心和反胃。作为一个德语单词，它是一个在我父母的母语中未被同化的片断，但它同时也帮助我们认识了这种曾经拯救过我们的文化的语言，在这种文化中罪恶被视为废弃的历史遗物。

每个美国家庭都有自己的一些说法和故事来保存和铭记他们脱离旧世界地狱的那一刻。我的妻子就有一个关于她母亲的故事。当她母亲还是少女、生活在香港的时候，她必须剪短头发，穿上男孩子的衣服躲在家里，以此逃过四处搜寻、凌辱中国女孩的日本兵。而在1930年前后，美国的黑人小孩——对他们来说地狱总在他们生活的地方——都可能还会有一位背上有鞭痕的祖父。在1960年，我的某些朋友仍有那么一个形容枯槁的姑姑或神经紧张的表亲，她们的眼里常有恐惧的神色，手臂上刺着蓝色数字。可是，时间无情地消融了记忆。对一个犹太人来说，今天想起现代德国，就好像走过一排连续的展览，它们展现出曾被烧成焦炭的树林如何再次开枝散叶、蓊郁成荫的过程——直到将大屠杀的印象抛到脑后，才离开展览。一切本该如此；哀悼之所至，智慧之所在，这是重续生活所必需的治疗和休憩。可是，如此滔天的罪行和它们如此之快被遗忘的事实不禁让人质疑，是否还有什么罪恶能够大到足

以证明其自身罪不可恕？

对于混杂着各种血统的美国人来说，记忆中那些遥远的与罪恶的对峙正是他们身份认同感的基本来源之一；但就像任何被传送的能量一样，记忆中与罪恶的对峙在传导的过程中会慢慢减弱直至消失。正如犹太人大屠杀变成了一个抽象事件一样，奴隶制的那段历史正被逐渐淡忘，同样的生疏也出现在美籍亚美利加人和土耳其大屠杀之间，出现在美籍华裔和日本军队实施的南京大屠杀之间，出现在美籍爱尔兰人和爱尔兰反英独立战争之间（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最后的这个战争还在继续）。那些我们曾用来弄清我们是谁、身处何方的道德印记，如今已荡然无存。这些印记的褪去使我们突然陷入了一种对自己身份的恐慌，那些难为外人所道的受压迫史凝聚成民族的集体伦理意识，而这种恐慌如同一块锋利的碎片深深嵌入其中。今天的美国社会，越来越多的族群热衷于讨论哪个民族的历史充满了最多的苦难和不公。

这种“多元文化”的竞争在道德层面上表现出一种蛊惑性。它试图替代日渐消逝于神秘的过往的那些罪恶景象。那些景象——纳粹党的冲锋队、塞尔玛的警犬——曾使美国人奋起投身于共同的道德目标。当克林顿总统——他生逢越战，却没有服过役——漫步在五十年前第一批进攻部队成功登陆的诺曼底海滩，并试图将美国的前驱在诺曼底的经历诉诸言语时，这一点显得尤为明显。这一纪念典礼的场面不由让人产生某种程度的怀疑，如果罪恶再次来袭，美国人是否仍能做好辨识它的准备？

我们对过去存在疏离感的例证之一便是，现在有关罪恶问题的严肃书籍往往一开篇就审慎地举例说明罪恶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好像这还值得争议一番。这些书读起来就像启蒙读物，要么列上一长串证据清单（一位当代道德哲学家这样说，“我们看见[罪恶]现身于……对亚美利加人、柬埔寨人、吉普赛人、印度尼西亚人、犹太人和俄国富农的大屠杀中”^[5]），要么就引用有线电视关于本地恐怖事件的报道（住在郊区的父母用香烟烫伤孩子，或者把他们锁在不开灯的壁橱里，孩子们身上满是他们自己的粪便）。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得知——尤其是从20世纪30至40年代那段似乎使大多数德国公民备受煎熬的民族集体失明失聪的历史中得知——即便是邻居遭到杀害或折磨这样的事件，也会像报纸上关于秘鲁地震伤亡人数的统计数据一样显得与己无关。一串又一串的名单根本无法表达它们试图再现的那些经历。

每个人都知道，罪恶大有在现代生活嘈杂的背景声中隐去的势头；我们也知道，“工业制度，”如同人类学家莱昂内尔·泰戈尔(Lionel Tiger)指出的一样，“是让人逃避道德唯一有效的润滑剂。”夜幕下，又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被冻死，在一系列似乎找不出根源的图景里又添一笔。我们应归咎何处？在泰戈尔形容为“[允许]独立的个体以完全成熟的自我道德去从事商业而不用顾及个人义务”的公司文化之中，懂行精明的投资者与心怀鬼胎的投机者的区别何在？^[6]甚至当“犯罪”的证据比瑞士银行里来历不明的巨额存款更加昭然若揭时——比如，在毒品贩子的火拼中被击中的孩子的尸体——我们仍然无法轻易地辨识出罪魁祸首。我们把他当作被称为文化的这个大实体的一个代理人；当我们抽身而去，较之于恼怒，我们更多的是感到迷惑不解。谁，或者什么，该对此负责？

三十多年前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发布的那些关于罪恶平庸化的言论可谓直击痛处，而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问题的顽固性。正是在纳粹杀人

机器的要员之一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身上，阿伦特发现了这种罪恶寻常化的终极象征——当这位忠诚守纪、办事高效的军官满不在乎地坐在耶路撒冷审判庭的玻璃隔间里时，他脸上就挂着一副半傻笑半搞怪的表情。此刻的他仿佛就是一个现代版的罪恶典型。

这是一个让人回味的景象。它让我们牢记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机构所推崇和褒扬的官僚纪律助长了一种可以用来开脱罪名的决定论(所谓“执行命令”，“尽我本职”)。艾希曼似乎在说，自我并不是一个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道德本体，而是功效与义务的集合体。艾希曼表现出的那种稀松平常令人讶异，更多地代表一种常态而非变态。而阿伦特的论断中最骇人的一个蕴意就是，罪恶这个概念与现代生活的本质可能实际上是无法调和的。她再次证实了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在一百年前就曾描绘的现象，即要找到一个地方，那里的人“不再谴责机构和社会，而能直面罪恶的真实源头”^[7]——自我，是何其之难。

可是，比起那个在被捕前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面临审判的那个艾希曼似乎不那么让人胆战心寒。在他被捕并接受审判之前，当他像一个毫不起眼的普通人那样过日子的时候，他确实实实在在地像个幽灵，似乎在预告着我们这个世界的降临。下面这份记录是以色列情报局局长从一个(名叫凯内特的)以色列特工那里获取的一手情报，展现了监控下的艾希曼在阿根廷避难所里的生活：

大约十一点四十五分，凯内特前一天见过的那个男人从大路的方向走回到房子；由于帆布罩上的窥视孔太小，凯内特无法确切地看清这个男人是打哪儿回来的。他打扮得相当体面，下身穿一条浅褐色的裤子，上身罩了一件灰色外套，打着一条纯绿色的领带，脚上穿了一双咖啡色的鞋。凯内特估计他身高在五尺八左右。他还描述了这个男人的其他一些细节：“四分之三的头都秃了，但脑袋两侧还有少量头发，大鼻子，宽额头，戴眼镜，似乎留着胡须，步伐缓慢。”

这个男人绕开前门，从房子的另一侧走了进去，然后俯身钻过房屋边缘的铁丝网，走到院子里。他在那个孩子身边呆了一小会，好像跟他说了几句什么，他还摸了摸孩子的头，整了整他的衣服——也许因为是星期天，这次那个孩子穿得整整齐齐。接着男人沿着楼梯慢慢爬上了房子的阳台。他一边用手里的报纸赶苍蝇，一边去开门，此时一个壮硕的女人从里面打开了门。当他进门的时候，他俩都在驱赶过道里的苍蝇。^[8]

这段描述的可怕之处在于：“里卡多·克莱门特(Ricardo Klement)”这个平淡无奇的一家之主和刽子手“艾希曼”之间存在着不言而喻却又十分可憎的反差。比这更可怕的是，看他在阳台上驱赶苍蝇就会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以色列人紧接着竭力重申了这个区别——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把握直至彻底消失。艾希曼—克莱门特成了一个“后现代”的形象，一个没有中心、缺乏自我的人，他仅仅是一个被观察者，其身份随着观察者视角的改变而随时变化。当最后一个纳粹猎人离开后，只有克莱门特会留下，而且没有任何人能够重新勾勒出艾希曼的样子。罪恶将会变成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我们似乎正朝着这个尽头走去。